

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4)

罗莎·派克斯的一生，除了中年时的短暂挫折外，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活到了 92 岁，尤其是晚年之时，荣耀与福祿的光环就没有离开过她一天。虽然她的名气无法与金恩相提并论，但相比之下，后者就显得福薄得多了。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是有其因果，也有其代价的。而金恩所付出的代价，也未免有些太高了。当小金恩于 1968 年 4 月 4 日死在詹姆斯·艾尔·雷伊 (James Earl Ray) 的黑枪之下时，他才刚过了 39 岁生日又 79 天。

如果回顾一下美国近代民权运动的发展史，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的近代民权发展史，就会发现那是以和平、暴力与法制三种方式交叉进行的。

第一种美国近代民权运动方式是和平抗争。这以金恩牧师为代表。金恩牧师以“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运动”为非洲裔美国人争取民权平等，这使他不但成为了非洲裔美国人的精神领袖，受到美国人民的赞扬，还得到了国际间的肯定，使他实至名归地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

金恩的伟大形象已经跨越一国一州，成为全世界追求民权者和受压迫的黑人们的偶像和希望。他被刺杀后，他所追求的全美国人民民权平等的理想，并没有及身而终，他用鲜血唤醒了美国人民的良知，也唤醒了美国普遍大众的民权平等意识。

金恩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的《我有一个梦 (I Have A Dream)》的划时代讲演，已随着他愈来愈大的影响力而家喻户晓。他被美国人民誉为美国历史上继乔治·华盛顿总统和亚拉伯罕·林肯总统之后，最伟大和最具影响力的第三位伟人。

如果金恩还在世的话，那么，美国总统的宝座，非他莫属！到目前为止，美国人中还没有可以超越他的成就，并取代他的伟人位置的人。

金恩于 1929 年 1 月 15 日出生于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他的父亲马丁·路德·老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Sr.)，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基督教牧师，母亲艾伯特·威廉斯 (Alberta Williams)，是一位善良的家庭妇女。

马丁·路德·老金恩的原名是“迈克尔·老金恩牧师 (Reverend Michael King, Sr.)”，他于 1934 年去德国旅游时，因非常敬仰新基督教徒马丁·路德而更名为“马丁·路德·老金恩”。

金恩有一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姐姐威莉·克丽丝汀·金恩 (Willie Christine King)，和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弟弟阿尔弗雷德·丹尼尔·金恩 (Alfred Daniel King)。阿尔弗雷德·金恩是“亚特兰大教堂圣歌合唱团”的团员。

金恩自小就聪明过人，15 岁时就跳了第 9 和第 12 级而上了“莫尔豪斯大学 (Morehouse College)”。1948 年，金恩社会学学士毕业。1951 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市“克罗泽神学院 (Crozer Theological College, Chester)”取得了神学学士学位后，又转进“波士顿大学 (Boston University)”继续攻读神学，于 1955 年 6 月 5 日，取得了神学博士学位。

1954 年，金恩以 25 岁的年纪，出任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 (Dexter Avenue Baptist Church)”的全职牧师。

1953 年 6 月 18 日，金恩与科莱塔·斯科特 (Coretta Scott)，在他母亲的后花园里成婚。两人共育有四个孩子，大女儿是约兰达·丹尼斯·金恩 (Yolanda Denise King)，长子是马丁·路德·金恩三世 (Martin Luther King

III)，小儿子是德克斯特·斯科特·金恩(Dexter Scott King)，小女儿是伯妮丝·艾伯特·金恩(Bernice Albertan King)。

深通斗争策略的金恩，早就景仰美国十九世纪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Philosophy of nonviolent civil disobedience)”，这正是金恩一展身手的大好良机。

梭罗是美国十九世纪一位不出名的怪杰，他于1817年7月12日，生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市(Concord)，出生时的名字叫做“戴维·亨利·梭罗”，后来因为觉得不顺口，就改为“亨利·戴维·梭罗”。

梭罗的一生都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市有缘，既生于此，亦死于此。他的寿命很短，1862年5月6日去世时，只活了44岁。他的身体本来就是多病且虚弱的，他在病重下剃胡子时割伤了自己，因患破伤风病毒而去世。

梭罗是一位真正的传奇人物，他于1833年至1837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数学和科学，在毕业时，学校按照校规，要他交\$5.00的毕业证书费用，但是梭罗宁愿不要那张文凭，也不愿交那不合理的\$5.00费用。当学校派人催促他时，他告诉来人说：“就让每一只羊留下自己的皮吧。”

梭罗在家中四位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他在家乡的中学毕业后，到哈佛大学专修他心爱的现代文学。毕业后返回家乡，在当地的一间中学以教书为生，由于讨厌美国传统式的体罚制度和封建的学风，愤而辞职，呆在家里苦思人生的难题。

1845年的美国国庆日，梭罗开始在家乡附近的“瓦尔登湖(Walden Lake)”岸边，用砍倒的松树，自建木屋隐居，用人类最原始与最简单的方式，独居长达26个月之久。他就这段出世而非凡的经历，用飘逸而流畅的笔锋，写成了《湖滨散记(Walden, Life in the Woods)》这本现代超越论的名著，是梭罗的代表作。

梭罗是一位作家、诗人、大自然主义者、超越论者、反蓄奴隶者、拒交税者和环境发展评论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策略家。他的个性是敢爱敢恨的，而且爱恨鲜明。他热爱自由，也用行动来支持自由。为了言行一致，他可以卖命地帮助一位黑奴出逃而不惜得罪当局。

爱恨分明的性格使梭罗公开反对美国政府的《奴隶叛逃法(Fugitive Slave Law)》，参与民权分子的地下挽救逃亡奴隶的运动。他反对任何不符合公义的事物，比如，他坚定地反对教堂有权征收税款。为了反对这些暴政，他以身作则，拒绝交付任何教堂税款。他提出的理论很简单：“难道学校和大学预科就不应该收同样的税款吗？”

1840年，梭罗爱上了从外地来访的埃伦·西沃尔(Ellen Sewall)，两人很快订了婚，但是当她的父母发现自己未来的女婿是谁后，勃然大怒，誓死反对，西沃尔不想在家庭与丈夫之间做出选择，于是解除婚约。自此以后，梭罗在感情上深受打击，发誓终身不娶。

梭罗为了一个为反抗蓄奴暴政而袭击美国政府军火库的死囚约翰·布朗(John Brown)，在其被捕前公开演讲呼吁，在其被弗吉尼亚州法庭吊死后，爬上市政府大楼顶，猛力撞钟以示哀悼。他平生最痛恨暴力，从不对压迫妥协。

1849年5月，梭罗在由伊丽莎白·皮博迪(Elizabeth Peabody)主编的《审美杂志(Aesthetic Paper)》上发表了一篇改变人类历史的文章《非暴力抵制政府论(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后来又将其改名为《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论(Civil Disobedience)》，这成了梭罗名传千古的绝唱。

在《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论》中，梭罗首先声明他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政府。他又声明说，一个公民之所以反对其政府，不应该是基于企业来反对政府，更不是基于个性来反对政府的，而是应该基于良知来反对政府。

在梭罗的理念中，“最好的政府应该是管事最少的政府(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least)”当一个政府不再按照人民的意愿来行使职权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应该站起来用“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论”去反对它，纠正它。

梭罗举例说，如果一个国家六分之一的公民是自由的逃犯或是奴隶的话，就好像外国的军队在这里用戒严式的军事管理着我们，那么，一场暴乱或革命的发生将是无可避免的。

梭罗的“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中心思想，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仁者无敌”的美国版。他的战略思想，顾名思义，一目了然：我不和你硬干，但也不听你的指使，你奈我何？

在《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论》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多少的回应和关注，直到十九世纪后，人们才开始发掘出这个无往不利的思想武器。随着时代巨轮的前进和抗争成功的案例逐一展现在世人面前时，梭罗的名字和他的“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越来越像出土的宝石，不时地发出使人惊叹的功勋。

1839年开始，梭罗的名字出现在市政府的人头税(Poll Tax)账册上。他写信要求将他的名字从账册上除名，不知什么原因，他的要求被糊里糊涂地批准了。但随后又再度将他的名字恢复在税册上。

1840年，梭罗开始拒绝交付他认为不对的人头税，当地市政府再三声明要将他法办，但他置之不理。1846年7月24日，由于梭罗拒绝交付人头税，马萨诸塞州税务官萨姆·斯戴布(Sam Staple)就判他入狱，他不吵也不闹，轻松地走进监房服刑。

梭罗的姑妈玛丽亚·梭罗(Maria Thoreau)不愿意也不忍心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才子去坐牢，大家就凑钱替他交付税务和罚金。虽然只坐了一天的牢房，但为梭罗提供了数篇散文的灵感和题材。可是他被释放出来后，还是依然固我，还是拒绝付税，而且说不付就不付，谁也拿他没办法。

梭罗的“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理论，的确是影响了不少人。一百多年以来，世界级的重要人物包括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印度的甘地、美国的威廉·奥维尔·杜格拉斯(William Orville Douglass)、金恩和约翰·肯尼迪，甚至现在的法轮功等，无一不深受其影响，也无一不是些惊天动地之辈。

欧美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如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威拉·卡瑟(Willa Cather)、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威廉·巴特勒·耶茨(William Butler Yeats)、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埃尔温·布鲁克斯·怀特(Elwyn Brooks White)、刘易斯·明福德(Lewis Minford)、法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还有亚历山大·波西(Alexander Posey)、古斯塔夫·斯蒂克利(Gustav Stickley)、约翰·伯勒斯(John Burroughs)、约翰·缪尔(John Muir)、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埃德温·蒂尔(Edwin Way Teale)、约瑟夫·伍德·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伯勒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戴维·布劳尔(David Brower)与劳伦·艾斯利(Loren Eisley)等，无不深受其影响。

托尔斯泰是俄罗斯世界级大文豪，其现实主义的《战争与和平》与《安娜》等著作，早已超越国界而成为全人类的智慧与财富，细看其书的内容，就可发现处处皆是亨利·梭罗“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的影子和精神。

印度圣雄甘地在1906年时读完梭罗的“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后，立即心领神会，找到了什么是促使印度走向独立的力量。他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运用“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为武器，牛刀小试，就使大英帝国主义招架不住，从而奠定了甘地终身奉行“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的决心。

美国作家韦伯·米勒(Webb Miller)在他1938年出版的《我找不到和平(I Found No Peace)》中，回忆甘地曾经对他说：

“梭罗的思想对我影响太大了。我采用了一部分理论并和我的朋友们分享，从而帮助我们印度得到独立。其实我是直接采用了他八十年前的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作为我们运动的主导思想。”。

甘地运用梭罗的“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不费一兵一卒，不放一枪一弹，不但将大英帝国主义赶出印度而得以国家独立，还赢得了国际间的肯定和尊重。

美国最高法院常务大法官杜格拉斯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地位无与伦比。自 1939 年 4 月 17 日，经罗斯福总统提名，接手前任美国最高法院常务大法官路易·戴维·布兰代斯(US Justice Louis David Brandeis)的空缺以来，一口气做了 36 年又 209 天，他是美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美国最高法院常务大法官，至今尚没有人打破他的这个任期纪录。

约翰·肯尼迪采用了梭罗的“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战略和思想，使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年轻有为最深得民心的总统，虽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但已经是万古流芳。

金恩出山后的第一招，使用的策略，就是梭罗的“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此举立即为他赢得大名，使对手低头认输，令敌人对他不得不刮目相看。

金恩在他的自传中说，他是于 1944 年在“莫尔豪斯大学”读书时，接触到梭罗的“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学说，他写道：

“梭罗宁愿坐牢，也坚持拒绝缴付那些用来将奴隶制度散播到墨西哥的税金，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的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学说，在着迷和景仰之下，我曾再三反复研究之，这种学说越来越使我坚信，不与魔鬼合作远比与好人合作更为重要。”

我认为再也没有比梭罗更有说服力的学说理论了，根据这种学说我们发动了几次成功的游行。梭罗的前所未有的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学说成为我们民权运动的理论基础。

无论是餐厅外的静坐，到自乘火车到密西西比州，到乔治亚州奥尔巴尼市(Albany)的和平示威，再到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巴士抵制运动，都可以看到逐渐成长的梭罗的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学说，已经将魔鬼们折服，得到应有的正义成果。”

所以说，凡是要与各种独裁暴政和寡头政权长期斗争者，不可不知：梭罗的“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是人类史上所向无敌的最高段数的政治斗争策略，除非不用，用之则无坚不摧，无敌不破，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失败的案例。

1967 年，美国政府为了肯定这位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特别发行一枚印有亨利·梭罗肖像的 \$0.5¢ 邮票来为之纪念。

1957 年，由于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成功，使金恩的政治视野，开始超越一州一市，投射在种族歧视极端严重的美国南方数州上。他成立“南方基督徒领袖会议”的崭新政治组织，并出任该组织的第一任总裁。

“南方基督徒领袖会议”是金恩的政治大本营。他紧紧地掌握住这个组织，不允许任何人向他的权威挑战，一直到他 1968 年去世为止，都从无间断的一直担任“南方基督徒领袖会议”总裁的职位。

“南方基督徒领袖会议”主要的任务是连络、团结、发动和组织起美国南方数州的非洲裔美国人教堂领袖们，运用“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策略，来为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司法公正与民权平等。

1958年，金恩出版他的首部政治书《向自由前进(Strive Toward Freedom)》，他用了不少的时间搞这种没有太大意义的推销活动。这年的9月20日，当金恩在纽约市的哈莱姆区的一家书店为自己的新书做签字推销时，他遇到了一生中第一次的政治行刺，差点丢掉性命。

一个叫做齐佐拉·韦尔·科利(Izola Ware Curry)的女非洲裔美国人，用开信封的钢刀，插进金恩的胸膛，几乎使他毙命。

当金恩带着钢刀到达“哈莱姆医院(Harlem Hospital)”时，由于钢刀插在大动脉旁边，很难救治，因为只要稍为一动，就会因大出血而死亡。医生们商量了很久，才将开刀急救的方案决定下来，先将整个胸部打开，再将插在里面的刀刃取出。金恩大难不死，逃过一劫。

科利是一位危险的女暴力精神病患者。她于1916年在乔治亚州阿德里安市(Adrian)出生。科利的一生，都是麻烦的一生，家庭麻烦，婚姻麻烦，工作麻烦，思想麻烦，交友麻烦，更要命的是，她最后得了比她所有的麻烦还要麻烦的精神错乱症。

科利的丈夫(James Curry)是一位游手好闲的酒鬼，两个人在婚后住在乔治亚州萨凡纳市(Savannah)，由于科利觉得萨凡纳市地方太小了，太没出息了，浅水养不活大鱼，所以就搬到纽约市去发展她的事业。

可是科利既没有学识，也没有专长，兼之好高骛远，只能当一份她从来就看不上眼的家庭佣人，从1959年开始，她连工作都找不到，三餐不继，生活无着落，这使她的精神错乱毛病时好时坏。她的精神错乱毛病使她产生了疑神疑鬼的错觉，幻想着到处都是想害她的敌人。

在科利的脑袋里，有两个主要的“敌人”：第一个是在纽约为非洲裔美国人权利打拼的“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这个人权组织成为了她的最大假想敌，虽然她叫不出一个“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成员的名字，但她坚信自己的失业，不是因为自己的懒惰，不是因为自己的神经病，而是因为“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到处破坏她名誉的结果。

科利更认定了一个事实：在“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内部，全是一些共产党，而共产党不单是美国的敌人，也是她自己的敌人。

第二个“敌人”就是金恩。科利认为这位假想敌是她所有的麻烦与不幸的最终原因。她认为金恩是一位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的领导人，因而要“为民除害”，所以她“有权”将金恩“处理”掉。

为了这两个假想敌，科利开始到处躲躲藏藏，“以免被害”，为了自卫，她花了26元去卖了一把意大利制造的自动手枪，带在身上自卫。

1958年9月20日下午3:00，科利外出逛街，在离她家四条街之外的一家书店外，看到一大群人在排队，等着金恩为新书签名。

当科利打听清楚原来是她的“敌人”在“闹事”时，她的神经病错乱症发作了，她排开众人，挤到桌子前面，向着正在新书上签字的金恩说：“你为什么要在这一堆小孩子？要搞就到学校去搞嘛，你为什么讨厌我？你为什么折磨我？”

金恩忙着为读者签字，并没有留意有人和他说话。科利发现这个“敌人”居然胆敢公然公开地在大众面前不理睬自己，不由得冒火了，她敲着桌子问道：“你是不是就是那个马丁·路德·小金恩？”

当金恩抬起头来要看看是谁在咆哮时，一把信封刀已经刺进了他的胸膛！站在旁边的治安警察立即将科利按倒在地，她的手袋散开，落了一地的杂物，警察们惊讶地发现，在杂物中，竟然有一把上了膛的手枪！

1958年9月21日，在监狱的审讯室里，纽约检察官霍华德·琼斯(Howard Jones)询问科利刺杀金恩的理由时，她理直气壮地说：“不是他，就是我，如果我不杀他，他一定会杀死我的！”

在警察局里，由两位纽约著名的精神病理专家西奥多·韦斯医生(Dr.Theodore Weiss)与约翰·卡西蒂医生(Dr. John Cassidy)对她联诊，结论是：科利的确是一位严重的“妄想性精神分裂症(paranoid schizophrenic)”病患者。

虽然大陪审团决定用意图谋杀罪来起诉科利，可是法医们断定，她根本就没有接受审判的能力。法官考虑了一下，在1958年10月20日下令，只能将她放到精神病院里去，结案了事。

1958年9月30日，金恩躺在“哈莱姆医院”的病床上，发表了一份书面文件，声明他不但宽恕了科利女士对自己的暴力行为，还要求大家为她祷告，祝她早日康复。这充分说明了金恩伟大的基督精神和他对“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的坚持，深为世人敬仰。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评论这件意外事故时说，“那位妄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齐佐拉·科利的一刀，几乎改写了整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

1959年金恩出版专著《对一个人的衡量(The Measure of A Man)》，书中勾画出他对国家、民族、宗教、社会、经济、理想和政治所期待的蓝图。从这一年开始，他领导着美国南方非洲裔美国人牧师们，开始为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平等而努力。

在当代民权运动大将精英中，其中最出名的有六位，世人称之为“六巨头(The Big Six)”，除了金恩之外，他们是“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都市联盟”的惠特尼·小杨格(Whitney Young, Jr., Urban League)、“卧车搬运工兄弟联合会”的菲利普·仑道夫(Philip Randolph, 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南方基督徒领袖会议”的约翰·路易斯(John Lewis)和“种族平等议会”的詹姆斯·法梅尔(James Farmer,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1963年是金恩人生巅峰成就的一年。是年8月28日，他带领着数十万各种族的美国人，群集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和平大游行，并在解放黑奴和挽救美国联邦的“亚伯拉罕·林肯的纪念堂”外，发表他那篇流传千古的《我有一个梦》讲演。

这是美国有历史以来最为成功的和平游行，为金恩奠定了无人可比的历史领袖地位，也为他带来诺贝尔奖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人的冠冕。

《我有一个梦》是一篇人类文明史上的登峰造极之作，也是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它是集霸气、傲气、正气、磅礴、尊严、仁慈、智慧和理想于一炉的佳作：

“我今天很高兴能与你一起共襄盛举，这将会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自由大游行。一百年前，就是现在我们站在他象征性的影子下，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这个重大法令，成为千千万万没有正义，生活在奄奄一息中的黑人奴隶们的希望信标灯，也成为结束他们历经漫长黑夜的囚禁，使他们能欢睹黎明的到来。

但是一百年了，黑人依然没有自由。一百年了，黑人依然悲伤地在种族隔离桎梏和种族歧视枷锁下被伤残。一百年了，在繁荣的物资世界里，黑人依然生活在广阔海洋的贫穷孤岛上。

一百年了，黑人依然被自己的大地放逐，憔悴地生活在美国社会的阴暗角落里。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渲染这些可耻的情况。

我们明智地来到国家首都，要兑现一张支票。当年我们共和国的设计师为《独立宣言》写出富丽堂皇的文字时，签下了一张对我们每一位美国人都有权继承的期票。这张期票许诺着所有的人，是的，黑人和白人一样，各种对‘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之‘不可剥夺的权利’。

今天，据我了解，站在有色人种公民的立场来说，美国很明显地没有履行这张期票的责任。美国不但没有履行此一神圣的责任，还给了黑人一张印着「资金不足」的退票。但是我们拒绝相信正义银行是破产的。我们拒绝相信这个遍地机会的国家会「资金不足」。所以，我们要来兑现这张支票，要求兑现这张全面自由与正义保证的支票。

我们同时来到这神圣现场，提醒美国目前强烈的紧急状况。这里已经没有时间参与奢侈的冷静处理，或者开出一副渐进主义的镇定剂。现在是实现将民主许诺的时候了。现在是从荒凉与黑暗的种族隔离深谷升起，走向阳光照射的种族正义大道的时候了。

现在是将国家的不正义种族政策流沙，升华至亲如兄弟的坚实石头上的时候了。现在是将神的孩子们的正义付诸于事实的时候了。

忽略目前强烈的紧急状况，将会是我们国家的致命伤。黑人们正当的不满情绪，有如酷热的夏天，离开正义和平等，爽快的秋天是不会来临的。

1963年不是结束，而是开始。那些希望黑人在激情过后国家便会恢复正常运作的人，会得到粗鲁的觉醒。在黑人们得到公民权利之前，他们皆不休息，也没安宁。如果正义的光明不实现，不断反抗的旋风就会动摇我们国家的根基。

但是我一定要告诉我的同胞们，一些关于带领我们进入正义之殿温馨开端的事情：在我们逐渐赢得正义的过程中，我们无须对他们以前的错误行为有所追究。让我们不要为了解决对自由的饥渴就喝下苦涩与仇恨的杯子。

我们永远要在尊严和纪律的高原上进行斗争。我们不允许将我们有创造性的抗争堕落为身体的暴力行为。重复再重复，我们必须以精神力量将肉体力量升华至庄严的高处。

那些令人惊异的新战斗性行为，正在吞没着黑人社区，但这不可导致我们对白人的不信任，有许多我们的白人兄弟，正如那些今天也出现在这里的一样，已经理解到他们的自由，是与我们的自由拴在一起而无法分开的。

我们无法单独前进。我们在前进时，我们必须发誓一定要在前进的前面，我们不能走回头路。有些人问民权献身者说，什么时候你才满意？只要黑人是警察使用不可告人的恐怖野蛮行为的受害者，我们永远不会满意。

只要疲惫不堪的黑人旅客在高速公路客栈或城市的酒店里不能寄宿时，我们永远不会满意。只要黑人的机动性只是从一个小的贫民窟搬移到一个大点的贫民窟时，我们永远不会满意。

只要我们的孩子被「只准白人」的牌子剥夺自我与尊严时，我们永远不会满意。只要黑人在密西西比州不允许投票，或者在纽约州不知道为何而投票时，我们永远不会满意。不，不，我们永远不会满意，不到‘正义如流水，公义似涌泉’，我们永远不会满意。

我不由得自觉地知道，你们当中不乏是为了遗弃尝试和苦难之人。你们当中有的是刚从狭窄的监狱牢房中出来的囚徒。你们当中有的是从其它地区来此探索——探索却被迫害的风暴打得血肉模糊，和被警察的残忍野蛮流风而摇摇晃晃。

你曾是这些人中同为苦难的受害者。继续老的信仰是无法赎回痛苦的。返回密西西比州，返回阿拉巴马州，返回南卡罗莱纳州，返回乔治亚州，返回路易斯安那州，返回我们北部城市中的贫民区和贫民窟，宣布无论如何也

好，这些状况一定会改变的。

我的朋友们，我今天告诉你，让我们不要在绝望之谷里打滚。就算我们今天和明天面对着各种困难，我依然有一个梦。那是一个深深地牢牢扎根于美国的梦。

我梦想着有一天，这个国家会兴盛，生活在真正的信仰里。我们握住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那就是所有的人，皆生而平等。我梦想着有一天，在乔治亚州红山坡那里，前奴隶与前奴隶主亲如兄弟一般地坐在一张桌子上。

我梦想着有一天，就算是一如密西西比州，那个狂热的不公正之州，狂热的压迫之州，会转换成自由与正义的绿洲。我梦想着有一天，我那四个小孩子，有一天能生活在一个判断他们内涵的、倚靠的不是肤色而是性格的国家。

我今天就有一个梦！我梦想着有一天，在阿拉巴马州那里，那些恶毒的种族主义者，与他们嘴唇上滴着‘干涉’和‘无效’言辞的州长。有一天在阿拉巴马州，小黑男孩与小白男孩，小白女孩与小黑女孩，可以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挽着手。

我今天就有一个梦！我梦想着有一天，每一个峡谷都是崇高的。每一个小丘和高山都能降低。崎岖不平的地方能够平坦。弯曲的地方可以成为直线。所有的人们都应该显现主的荣耀。这是我们的希望，这也是我要带回南方去的信仰。

有了这些信仰，我们可以把绝望的坚石转换成那希望之高山。有了这些信仰，我们可以将不调和的吵闹声转换成美妙的深厚兄弟情谊交响乐。

有了这些信仰，我们可以一起来工作，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奋斗，一起去坐牢，一起去维护自由。大家心照不宣的都明白，我们总归有一天会自由。这就是为的那一天——那一天就是所有神的孩子们全在歌唱着新的意义：我的国家是你甜美的自由大地，我为你而歌唱，我的父亲死在朝圣者骄傲之大地。

让每一个山腰上，响起自由之声！如果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的话，这必然会成为事实。因此，让自由从新罕布什尔州奇异的小山顶上响起来，让自由从纽约州的强大高山上响起来，

让自由从宾夕凡尼亚州的艾丽盖尼山脉 (Alleghenies) 上响起来，让自由从科罗拉多州积雪封顶的洛基山脉 (Rockies Mountain) 上响起来，让自由从加利福尼亚州曲线优美的斜坡上响起来。

不光只是这些，让自由从乔治亚州的石头山 (Stone Mountain) 上响起来，让自由从田纳西州瞭望远景的大山上响起来，让自由从密西西比州的每一个小山丘，和鼯鼠丘 (Molehill) 上响起来，从每一个山腰上，让自由响起来。

当这些发生时，当我们允许自由响起来时，当我们让它从每一村每一乡，从每一州每一市都响起来时，我们可以加速那天的到来的。

所有神的孩子们，白人和黑人，犹太人和异教徒，新教徒和天主教，都可以互相挽着手高唱老黑人精神的赞歌：最终自由了！最终自由了！谢谢全能的神，我们最终自由了！”

金恩只是站在台前的偶像，真正的张良，真正的孔明，是站在金恩幕后的贝阿德·拉斯廷 (Bayard Rustin)。具有剑胆琴心性格的拉斯廷，虽然称不上是位学识丰富的思想家，但却是一位眼光远大的政治策略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群众运动专家。

拉斯廷于 1912 年 3 月 17 日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西切斯特市 (Westchester)。他是第一位提出非洲裔美国人不但

要在交通工具上和白人平等，还要在工作、教育、职位、性别和住宅等方面也要平等概念的非洲裔美国人。

拉斯廷是第一位在美国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非洲裔美国人民权领袖，也是第一位鼓吹同性恋民权的非洲裔美国人。他往往发出惊人之论，使人深省，比如说，他几次公开的声称他是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制度(democratic socialism)”的。

拉斯廷的后半生，一直到 1987 年 8 月 24 日，以 75 岁的高龄去世为止，都是奉献在美国男女同性恋的民权运动上，可谓劳苦功高。他的理论很简单，他认为男女同性恋并不是病，是自然人性的流露，而真正的病，是美国这个不能容纳和接受男女同性恋事实的社会。

拉斯廷的前卫思想和观念，在六十年代时，被世人视之为奇谈怪论，视之为妖言惑众，甚至于视之为洪水猛兽。如今观之，只能惊叹和佩服他的高瞻远瞩和高超过人的智慧。

从 1955 年到 1960 年的五年时间里，拉斯廷是金恩主要的政治顾问，在许多金恩的策略和行动中，都可看到他的影子。而整个 1963 年的华盛顿和平大游行，就是出自拉斯廷的策划与安排，可以说这是他精心炮制的代表杰作。

拉斯廷和金恩一样，是研究印度圣雄甘地的学者，也是美国政治策略大师梭罗理论的信服者。由于拉斯廷与美国共产党之间的密切关系，最后导致金恩因信念不同，除工作外，与他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在拉斯廷的精心策划下，1963 年的华盛顿和平大游行，有五大诉求：第一，全国的公立学校，立即全面地彻底地停止种族歧视的种族隔离政策；第二，美国国会要有实际性和有意义的民权立法，包括在全美国不得在职业上有任何的种族歧视；第三，保证民权工作者免受警察的残酷对待；第四，全美国的工人，底薪不得少于每小时 2 元；第五，华盛顿首都特区在美国国会特别委员会的监督下彻底的自治。（待续）

2011 年 1 月 21 日 高胜寒 在 美国华府